

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 对中国被试适用性之初步验证^{*}

刘 萃 侠

Abstract : The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ding tendency (SDRT) usually makes the validity of self-report data very low, and the MCSD Scale is a common measure to assess SDRT and its underlying construct—the need for approval. But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ed Chinese subjects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the desire to appear honest or modest or to avoid of brag, and the stronger this social approval desire is, the lower, but not higher as the constructors of MCSD expected, the scores on MCSD is. So, MCSD is not applicable to Chinese subjects very well.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inese subjects were more responsive to negative items (one's faults) than to positive ones (one's merits) in MCSD.

一、问题的提出

问卷调查与量表测量是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收集个体的态度、行为等数据的常用方法。但许多社会规范已规定了什么样的态度与行为是社会所提倡的、被他人所称道的,或正相反。所以,对这些规范有所了解并受其引导的人们,或为免受惩罚与批评,或为维护自尊、给人留下好印象,在问卷或量表上的反应常是否认自己拥有不被赞许的态度或行为,而肯定自己拥有正向的特质。这种反应倾向被国外学者称为社会赞许性反应倾向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ding tendency, 简称 SDRT, Edwards, 1957), 它是影响调查与测量数据效度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在国内,虽社会赞许性反应倾向这一术语很少被提及,但许多研究者在问卷调查等数据中已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如,成子娟等 (1991) 的调查得出:小学 4 - 6 年级儿童没有一个人回答与异性有来往;可他们的老师说谁给谁写条子的事时有发生。徐安琪于 1987 年对上海 1000 名已婚男女的调查得出,其中有 16.7% 的妻子与 17.4% 的丈夫自述双方从不吵架。徐安琪 (1991) 认为,由于不少人对夫妻冲突的个人隐私较隐讳,夫妻吵架的实际比例可能还要高些。不过,在国内的调查研究中,除保持被试的匿名性以外,其他控制 SDRT 的方法使用不多,所以急需为国内介绍国外已有的控制 SDRT 的方法。为避免盲目搬用,少走弯路,谨慎的做法就是先对国外已有的方法加以审查,找出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探索并创造出适合控制中国被试 SDRT 的方法。这正是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所在。

^{*} 本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资助。在课题申请过程中得到杨宜音及评委沈崇麟等的很多指点,在此对他们及所领导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更要感谢杨中芳老师多年来的指导与帮助。

70 年来,SDRT 成为研究最多、也最令研究者头疼的一种反应偏差或人格特质。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已发展出许多方法来对付 SDRT,如使用中性或迫选式题目、主成分删除法、假通心仪、社会赞许性(SD)量表等,其中 SD 量表因其适用范围广,使用灵活、方便、经济而成为常用的一种方法,用以删除高分者的数据,矫正数据或验证其他量具的效度。到目前为止,使用最多的一种 SD 量表是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以下简称 MCSD,Crowne & Marlowe,1960),用以测量 SDRT 背后潜在的心理构念——赞许需要(the need for approval)。MCSD 是模仿 MMPI 测谎量表而编制的,即选用被社会赞许但不常发生,或不被社会赞许但常发生的想法、行为作题目(如:从不食言;背后讲人闲话)。若被试对前类题目回答肯定,或否认后类题目,那么他就可能在撒谎;而且他的这类反应越多,即他的分数越高,那他说的谎就越多,他的赞许动机就越强。但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如,Borkenau & Ostendorf,1992;McCrae & Costa,1983)表明,MCSD 并不是测量反应偏差(说谎)的好工具,高分数并不意味着“装好”的程度就强。如,麦克瑞与科斯特(McCrae & Costa,1983)的研究发现:在 MCSD 量表上得分高的被试,其配偶对他/她的评定也非常好。也就是说,被试在 MCSD 量表上得分高,并不表示他们说的谎就多。为什么会如此呢?笔者推测原因可能有三:

1. 虽然 MCSD 是模仿 MMPI 中的测谎量表而编制的,但各项目所描述的行为所发生的频率并没有评定,且项目的赞许性评定也只是简单的“赞许”或“不赞许”两种定性评定,“中性”选项并没有给出。巴拉德(Ballard)等(1988)发现 MCSD 中有 4 个题目是中性的;刘萃侠(1992)据 102 个北京大学学生的评定得出,其中有 8 个题目(如很注意衣着;在家与在饭馆吃饭的吃相一样好)为中性,有 2 个题目(如见到讨厌的人也彬彬有礼)的评定方向和原来的正相反。所以,此量表中的题目是否都满足“赞许但少见或不被赞许但多见”这一选题标准还需验证。

2. 即使 MCSD 中所有的题目都符合这一标准,也不能保证量表得分越高,说谎越多,进而赞许动机越高。因为“诚实”也是一种被社会所赞许的品质,“表现诚实的需要”(the need to appear honest)也是一种“赞许需要”,但却会降低得分,这是一种测量吊诡(Crandall, et al., 1965),赞许需要强,并不一定得分高。中国文化向来提倡谦虚、不吹牛,“君子耻其言过其行”、“谦受益、满招损”、“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吹之”等谚语、格言无不告诫人们要谦虚、自制。所以,杨中芳(1996)曾怀疑,西方吹牛式的社会赞许性量表不一定适合中国人。因谦虚、不吹牛这种“赞许需要”越强,量表得分却越低而不是越高。早在 1946 年,米尔与哈塞威(Meehl & Hathaway)就发现 MMPI 测谎量表对天真的被试来说是一个圈套,但对精明、有洞察力的被试而言,多不会傻到否认如此常见的行为或肯定这般不常见的行为。所以,表现诚实、谦虚或不吹牛的需要是否会在 MCSD 的作答中有所体现,还需检验。

3. 在 MCSD 中,肯定被赞许的行为与否定不被赞许的行为都记同样的分数(都是 1 分),并总加来表示社会赞许动机或 SDRT 的程度。即表示这两种反应对被试具有同样的意义、相同的重要性。Kitayama 等(1997 年)的研究发现,日本人认为失败的情境比成功的情境对自尊的影响更大,即前者所导致的自尊的降低程度远大于后者对自尊的提升(转引自 Heine 等,1999:782)。时蓉华与王伟(1985)对道德品质自我评价的调查表明,中国学生否定负性品质的频率要高于对正性品质的肯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听人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见,没有或少有缺点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至于拥有长处与优点,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弄不好,还会招致嫉妒与打击,只要自己知道就好,不到关键时刻何必表现出来

呢！所以，对中国人而言，不管是真谦虚，还是为了人际和谐、保护自己的假谦虚，他们对正性题目的肯定可能会少于对负性题目的否定，而且，越是赞许程度高的正性题目越少肯定。换言之，肯定被赞许的行为与否定不被赞许的题目对中国人不具有同样的意义、相同的重要性，负性题目对中国被试的威胁更大，更能反映出被试的赞许需要的高低。而且，两种反应可能测量的是不同的心理过程与动机，如，否认负性行为，是一种较消极的“但求无过”的心态，以避免不被赞许；而肯定正性行为，是一种较积极的自我美化与提升；两者可能会对不同类型的行为有不同的预测能力，所以，这两种反应应分开记分，而不是总加起来。

本研究主要验证以上 MCSD 所存在的第 2、3 个问题是否存在，以便以此为依据来反思 MCSD 是否能够有效地测量中国人的说谎或社会赞许性动机，并为将来编制中国人的 SD 量表奠定基础。

根据以上这些分析，笔者假设：

1. 对中国人而言，“谦虚”或者说假装诚实也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尤其是对赞许性程度较高的正性题目，更不会回答自己拥有这样好的行为。
2. 对中国被试而言，否认负性行为要比肯定正性题目更频繁，因他们对自己的缺点更敏感。

下面就对这两种假设加以试验性的验证。

二、方 法

(一) 修订 MCSD 量表

考虑到中美文化既有差异又有共同之处，同一种行为，为美国被试所赞许，并不一定为中国被试所认可。刘萃侠(1992)让 102 个北京大学学生评定 MCSD 中的每道题目所述的行为是“好的、无所谓好与坏的、还是不好的”。得出的结果，其中有 8 个题目为中性，即无所谓好与坏；有 2 个题目的评定方向和原来的正相反。再经因素负荷量、题总相关、区分度等项目分析，最后只剩 14 个符合各项指标的题目。因题目过少，从刘萃侠(1992)模仿 MCSD 编制的“大学生社会赞许性量表”中选出 6 道内容不重复的题目，加在 14 题中，构成本研究所用的修订的 MCSD 量表。

(二) 题目的社会赞许性特征评定：方向与程度

1998 年，杨中芳编制了一个生活意见问卷，其中包括被修订的 MCSD。让 48 名北京大学学生(27 名男生，21 名女生，年龄在 16 - 24 之间)在 6 点量尺上评定：若一个人做了下列行为，你对他/她印象如何？1 代表“非常坏”，6 代表“非常好”。若题目赞许性评定的平均分小于 3.5，则此题目为负性的、不被赞许的；否则是正性的，被赞许的。结果是，有 11 道为正性题目，9 道为负性。把正性题目的评定值减 7，这样它们的平均数就可以与负性题目直接比较。然后把正负性题目按赞许性评定的平均数各分为高、中、低三组，以便方差分析。

(三) 被试在 MCSD 上的反应

刘萃侠(1992)让北京大学 9 个系学生 113 人在匿名的情况下回答：他们若是如题目所描述的那样，就选“是”，否则就选“否”。若被试对正性题目回答“是”或对负性题目回答“否”，都得 1 分；反之，得 0 分。把每道题的得分加起来，作为被试在此题上给予赞许性反应或赞许动机强弱的指标。在本研究中，这些数据被重新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把题目赞许性评定的方向(正性与负性)及程度(高、中、低)作为自变量,赞许性反应(肯定正性行为,否定负性行为)为因变量,进行 2 ×3 的方差分析,以了解被试在不同题目上如何反应。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题目的社会赞许性特征对赞许性反应的作用		
变异来源	F	P
赞许性方向	1. 075	0. 317
赞许性程度	1. 909	0. 185
赞许性方向 ×程度	4. 520	0. 031 *

* P < 0. 05

从表 1 可以看出,题目的社会赞许性方向与程度的主效应都不显著,而两者的交互作用却显著($F = 4. 520, P = 0. 031 < 0. 05$)。这一结果说明,被试大学生并不是单独地根据赞许的方向或程度来回答,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反应。那么他们在这 6 类(2 ×3)题目上是如何给予不同的反应的?从交互作用图(见图 1)及相应的统计结果(见表 2)可一目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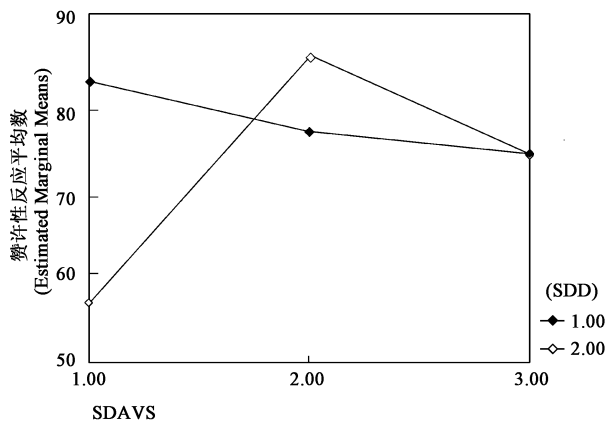


图 1. 题目的社会赞许性方向与程度对赞许性反应的交互作用
(SDD:赞许性方向:1 - 正性,2 - 负性;SDAVS:赞许性程度:1 - 低,2 - 中,3 - 高)

表 2 被试在 6 类题目上的赞许性反应平均值					
赞许性方向	程度	赞许性反应平均数	百分数(%)	F	P
正性	低	82. 33	73	0. 525	0. 610
	中	76. 07	67		
	高	74. 20	66		
负性	低	56. 40	50	6. 843	0. 028 *
	中	85. 33	76		
	高	74. 00	66		

* P < 0. 05

从图 1 与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出:

1. 在正性题目上,它们被赞许的程度越高,被试给予的赞许性反应反而越低(73 % - 67 % - 66 %)。这种关系表明,越是被赞许的行为,人们越难做到,被试表现“诚实”或“谦虚”的需要就越强,就越易否定自己拥有这些行为。社会赞许性研究的鼻祖爱德华(Edwards,1953)曾报告,在个人偏好量表中,题目的赞许性评定值与被试给予肯定(即“是”)回答的频率的相关为0.87。如此高的相关表明,题目越是被赞许,则被试越回答自己“是”这样的。但在 MCSD 上,中国被试的反应正相反。原因也许是两种量表题目不同,或/和中国被试表现“诚实”、“谦虚”的需要很强烈。但是,正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并没有显著差异($F = 0.525, P = 0.610 > 0.05$),且都较高(大于 65 %);这说明,“诚实”、“谦虚”的需要并不一定能超越“给他人和自己留下好印象”(除谦虚、诚实外)的动机。不过,“诚实”、“谦虚”的需要仍然在起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对赞许程度较高的题目。据此,假设 1“对中国人而言,‘谦虚’或者说假装诚实也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尤其是对赞许性程度较高的正性题目,更不会回答自己拥有这样好的行为”得到验证。那么,MCSD 就不能很好地测量中国被试的赞许性需要与反应倾向。

2. 在负性题目上,不被赞许程度低的题目有 50 %的人否认,人数最少,中度不被赞许的题目否定的人最多(76 %),其次是高度不被赞许的题目(66 %);且三者之间的差异显著($F = 6.843, P = 0.028 < 0.05$)。这说明,被试对负性行为确实比正性题目敏感、重视(正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差异不显著,见上文),所以做了较精细的区分,给予不同的反应。这一点证明了假设 2 的后半部分,即“他们对自己的缺点比优点更敏感”是正确的。但出乎笔者意料的是,对高度不被赞许的题目,被试反而比中度不被赞许的题目否认的更少。从常识来讲,应该是越小瑕疵越易承认,因承认也无关痛痒;越大错越应否认,因对自己的威胁越大。难道被试会“谦虚”到越大错越承认?或许除“谦虚”、“表现诚实”这些动机在起作用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克罗恩与马洛(Crowne & Marlowe,1960)在编制 MCSD 量表时,并没有评定题目所述行为的发生频率。也许被试在作答时,除了题目的社会赞许性特征以外,还会考虑题目发生的频率,对常发生的行为,就回答“是”,即给予从众性的反应。因“法不责众”,这样的回答无疑是较安全的。由此,在将来的研究中应把题目的发生频率也考虑进去。

为了验证“对中国被试而言,否认负性行为要比肯定正性题目更频繁”(见假设 2 中的前一部分)这一假设,对在正性与负性题目上给予赞许性反应的频率进行 T 考验,结果见表 3。

表 3 正负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差异检验

题目类型	平均数	标准差	T	P(单尾)
正性	77.09	10.37	1.474	0.079
负性	68.00	17.01		

(n = 113)

与假设相反,被试对负性题目的否定反而少于对正性题目的肯定($68.00 < 77.09$),虽然差异不显著($P = 0.079 > 0.05$)。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中国被试大学生并不是单独地根据赞许的方向或程度来回答,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反应(见上文图 1 与表 1),所以,两者的主效应都不显著,而交互作用却显著。二是正负性题目的赞许性程度并不一定相同,无法公平、有效地单独评估题目的赞许方向对赞许性反应的作用。为了检验后一推测是否正确,把正负性题目的赞许性评定值的平均数之差异是否显著加以检验,T 考验的结果见表 4。

表 4

正负题目赞许性程度的差异考验

题目类型	平均数	标准差	T	P(单尾)
正性	2.71	0.4689	- 2.130	0.024 *
负性	2.27	0.4382		

* $P < 0.05$

与推测的一致,负性题目的赞许性程度平均数确实低于正性题目($2.27 < 2.71$),而且差异显著($T = -2.130, P = 0.024 < 0.05$)。可能是因负性题目中赞许程度较低的较多,对被试构不成太大威胁,所以否认的就较少,从而使被试对负性题目的否定并没有多于对正性题目的肯定。在今后在研究中,若想重新验证被试对负性题目的否定是否多于对正性题目的肯定,应注意把两者的赞许程度加以匹配。

四、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 本研究的结论

1. 被试对负性行为确实比正性行为敏感、重视,因正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差异不显著,而负性题目间的赞许性反应差异却显著。但是被试对负性题目的否定并没有多于对正性题目的肯定,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生并不是单独地根据赞许的方向或程度来回答,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反应;而且负性题目的赞许性程度平均数低于正性题目,即负性题目中赞许程度较低的较多,对被试构不成太大威胁,所以否认的就较少。

2. 被试在 MCSD 量表上的反应是:在正性题目上,越被社会赞许的题目,被试肯定自己拥有的人数越少,可能是以避吹牛之嫌;在负性题目上,小错、大错多承认,中等错误反而否认。所以,谦虚、不吹牛这种中国文化所提倡的“赞许需要”在 MCSD 中有很强的表现;而且此需要越强,量表得分越低,而不是像西方量表编制者所预期的那样越高。所以,此量表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人。至于什么样的量表或其他方法适合测量与控制中国人的 SDRT,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也是笔者今后的主攻方向。

(二) 对相关研究的前瞻

调查结果是由研究者与被调查者共同建构的,问题中的许多线索都会被被调查者所察觉,并对他构成意义,从而决定着他对问题的反应。所以,在对 MCSD 的继续研究中,除了本研究所探讨的题目的 SD 特征外,至少还应包括下列三方面内容:

1. 题目所述行为在人群中发生的频率对被试作答的影响。例如,当被试觉得很少有人把售货员等多找自己的零钱主动退回去,那他在 MCSD 中对此题的回答很可能是如实回答,即不一定给予赞许性反应。因一事情虽不好,但大家都在做,承认自己也在做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也就是说,自己的责任感、愧疚感就可以减轻很多。

2. 题目中所含频率副词对被试作答的影响。因 MCSD 中有 27 个题目含有“总是”、“从未”、“有时”、“偶尔”这类副词,杰克逊与麦辛克(Jackson & Messick, 1958)发现在加利福尼亚 F 量表中,有些被试总是否定含有前两种副词的题目,肯定含有后两种副词的题目,而不管题目的内容是什么。这两位作者把此种反应定势(response set)称为“过分概括化”(over-general-

ization)。但博克诺与奥斯坦道夫(Borkenau & Ostendorf, 1992) 怀疑被试并不是针对 MCSD 题目中的特殊词汇来反应,而是表现出一般的自我图式。若经检验前者正确的话,那被试在 MCSD 量表上的分数并不都代表赞许动机或说谎的程度。

3. 被试的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自尊水平、社会智商等)对赞许性反应的影响。

另外,本研究所用的题目不多,而且部分数据获得于 1992 年,所得结论是否适合于今天,还需多用些题目在将来的研究中验证。

不幸的是,不管研究者如何费煞苦心地预防与降低 SDRT,它仍然无法完全根除,因它根植于个体基本的社会需要及社会存在与正常运作的要求;无论研究者如何千方百计地去测量,仍然无法准确地得出被试说谎的程度,因“尽管真理真实存在,但没有明确的路可通达”(Funder, 1995: 656),即我们无法找到真实的效标来比较。例如:

(1) 若问被试他们自己的反应是否准确、诚实(就像有些文章所做的那样,以此来检验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虽然自己对自己比较了解,但这种信息上的优势常被自我保护与美化的动机所平衡掉;所以,他们很少承认自己的回答不诚实、不准确。即用来检验其他数据的效度的问题本身就不一定具备效度。况且,即使被调查者很诚实,他们也只能意识到有意的歪曲与隐瞒,对于无意的自欺(self-deception, Paulhus, 1984) 却无法察觉。因个体不仅在自我报告时受自尊需要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建构自我概念时同样受其支配。如对自我一致性的研究表明,个体对与自我概念一致的信息就接受,反之就拒绝(Campbell, 1990);即个体有选择地吸收有利于自尊的信息来形成自我概念。久而久之,就真的以为自己是这个样子,在自我报告时就会认为自己是诚实的。

(2) 若用同伴或关系密切的他人的评价作为自我报告准确性的比较标准,因关系太密切(如麦克瑞与科斯特[McCrae & Costa, 1983]用配偶),必然也会有社会赞许性反应,因太太不好,作丈夫的自己也没面子;而不太熟悉的人(如同伴、同事或观察者)了解的信息必定不多,且多是外显性的行为,毕竟表现于外在场合的公我与私我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人的评定也很难作为自我报告准确性的客观指标。

(3) 即使在问卷是完全匿名与保密的情况下,而且假设被调查者完全相信问卷的匿名性与保密性,“客我”仍然要面对“主我”、“超我”或者说是良心的审查与评价,为了使自己感觉自己不错,他/她也会给予社会赞许性反应,从而使调查结果偏离真实。

正因为赞许需要的根深蒂固及“效标问题”(criterion problem),使自我知觉与报告的准确性研究停滞了许多年(John & Robins, 1994),也使自陈式调查研究的效度成为研究者所关注又难以有效检验的问题。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心理学家与调查方法学家采用了“绕开准确性问题来解决它”(Jones, 1985: 77, 转引自 Funder, 1995: 54) 的策略,致力于了解问题作答(question-answering) 背后的认知与沟通过程,并研究问题措辞、选项、顺序等因素对作答过程的影响。如斯特克与马丁(Strack & Martin, 1987: 123 - 148) 把被调查者对问题的回答分成 4 个步骤:(1) 对所问问题的理解,包括对句子文字意义(literal meaning) 的理解及对提问者的意图,即问题的实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 的理解;(2) 对与问题有关的信息的回忆与提取;(3) 对自己情况的估计与判断,并把这些判断加以量化以与研究提供的选项相符;(4) 出于自尊与表现的原因,把私下的个人的判断加以改头换面,再报告出来。不过,这一问题作答的顺序有时也会改变。施瓦茨(Schwarz) 等(1991) 发现,等距量尺上标定的数字不同,会造成被试对问题的理解不同。他们用两种量尺来评定被调查者在生活中感到成功的程度,一种是从 0

(一点也不成功)到 10(非常成功),另一种是从 - 5(一点也不成功)到 5(非常成功)。结果是有 13%的人在 0 - 10 量尺上的反应在 0 - 5 之间,有 34%的人在 - 5 - 5 量尺上的反应在 - 5 - 0 之间。随后的研究表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对“一点也不成功”这个词的理解不同。在 0 - 10 量尺上被调查者把“0”理解为“没有杰出的成功”;在 - 5 - 5 量尺上,把“- 5”理解为“非常失败”。即他们把带有正负数字的量尺当作双极的维度,代表正相反的两个特征;而把只有 0 与正数的量尺当作单维,指的是同一特征的不同程度。斯特克(Strack)等(1988)对婚姻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表明,当先问被调查者对生活的满意度,再问对婚姻的满意度时,两者相关为 0.32;当问题顺序颠倒时,相关则为 0.67。这是因为先问婚姻满意度时,提取出来的与婚姻有关的信息作为后一问题,即生活满意度的判断依据之一,所以产生了同化效应。

以上这类心理学家与调查方法学家联合起来所从事的跨学科的研究被称为“调查方法论的认知研究”(cognitive aspects of survey methodology),在施瓦茨(Schwarz)等人的努力下已出版了很多介绍这一领域新成果的论文集。而且,在国外,大多数调查中心都建立了“认知实验室”(cognitive laboratories),专门从事大规模问卷施测前的认知研究,对问卷可能存在的问题加以探查、修正,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提高调查结果的效度。

为了更有效地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研究者除了尽可能地控制与降低 SDRT 外,还应借鉴“调查方法论的认知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与经验,注意问题的措辞、选项、顺序,问卷的标题与注名的研究机构等因素对调查结果的影响。这些因素更容易由研究者所控制,不过,对研究者编制问卷的技巧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在今后的问卷调查中,应考虑到被试在作答过程中的动机与认知特点,双管齐下,将会更有效地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

参考文献:

- 成子娟、廖凤林、姚林,1991,《小学儿童双向友谊发展的调查研究》,《现代中小学教育》第 2 期。
- 刘萃侠,1992,《逆反心理的概念分析及其测量》,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 杨中芳,1996,《如何研究中国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 时蓉华、王伟,1985,《学生道德品质自我评价倾向性的研究》,《心理学报》第 2 期。
- 徐安琪,1991,《我国城市婚姻的现状与趋势》,《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Ballard, B., Crino, M. D. & Rubinfeld, S. 1988, "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 and the Marlowe-Crowne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Psychological Report*, 63.
- Borkenau, P. & Ostendorf, F. 1992,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s as Moderator and Suppressor Variable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
- Campbell, J. D. 1990, "Self-Esteem and Clarity of the Self-Concep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 Crandall, V. C., Crandall, V. J. & Katkovsky, W. 1965, "A Children's Social Desirability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1.
- Crowne, D. P. & Marlowe, D. 1960, "A New Scale of Social Desirability Independent of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4.
- Ewards, A. L. 195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udged Desirability of a Trait and the Probability That a Trait Will be Endorsed."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37.
- 1957, *The SD Variable in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New York: Dryden.
- Funder, D. C. 1995, "On the Accuracy of Personality Judgment: A Realistic Approach." *Psychological Review*, 4.

- Heine, S. J., Lehman, D. R.,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9, "Is There a Universal Need for Self-Regard?" *Psychological Review*, 4.
- John, O. P. & Robins, R. W. 1994, "Accuracy and Bias in Self-Enhancement and the Role of Narciss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
- McCrae, R. R. & Costa, P. T. 1983, "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s: More Substance than Styl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
- Meehl, P. E. & Hathaway, S. R. 1946, "The K Factor as a Suppressor Variable in the MMPI."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30.
- Jackson, D. N. & Messick, S. 1958, "Content and Style in Personality Assess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
- Paulhus, D. L. 1984, "Two-Component Models of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
- Schwarz, N., Knauper, B., Hipper, H. J., Noelle-Neumann, E. & Clark F. 1991, "Rating Scales: Numeric Values may Change the Meaning of Scale Label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
- Strack, F. & Martin, L. 1987, "Thinking, Judging, and Communication: A Process Account of Context Effects in Attitude Surveys." In H. J. Hippler, N. Schwarz & S. Sudman (Eds.),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Survey Methodology*,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 Strack, F., Martin, L. & Schwarz, N. 1988, "Prim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Information Use in Judgments of Life-Satisf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

作者系北京大学心理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宛丽